

憶董老

第二輯

湖北人民出版社



忆董老

(第二辑)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组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忆董老

第二辑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组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6.625印张 165,000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

统一书号：3106·652 定价：0.52元

目 录

怀念尊敬的董必武同志·····	王观澜 (1)
一个模范的共产党人·····	吴亮平 (4)
“始终不息地为党工作”	
——怀念敬爱的董老·····	童小鹏 (6)
刻骨铭心 永志难忘	
——忆董老对我的关怀教育·····	李坚真 (18)
董老在美国·····	唐明照 (24)
从汤池到北京	
——董老指引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杨显东 (31)
董老领导下的抗大四大队·····	季诚龙执笔整理 (49)
忆董老在青年、统战工作中的二三事·····	廖似光 (60)
怀念党的元老——董老·····	何启君 (66)
记在抗大四大队的几件事·····	温建平 (73)
在董老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的回忆·····	何世庸 (76)
忆董老在重庆对中小工厂主的统战工作·····	陈 钧 (84)
回忆董老在重庆期间对我的教诲·····	祝世康 (87)
记董必武同志在大连时的几件事·····	郭述申 (93)
董老为我国的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呕心沥血	
····· 杨秀峰 陶希晋 聂荪荪 郭 纶	(102)
为子孙后代造福	
——回忆董老关心林业, 为绿化祖国日夜操劳	
····· 雍文涛	(110)
追忆董老 ·····	金默生 (120)

“不许饿死一个人”

——忆董老在建国初期领导救灾工作的点滴事迹

.....	赵秀山 (124)
随董老接收国民党政府文案及巡视宁夏的回忆	黑伯理 (134)
难忘的历程	王宝宣 (138)
无限深情永难忘	谢和赓 (144)
董老三度回红安	中共红安县委员会 (154)
伟大出自平凡，精神见于细微	
——学“准则”，忆董老	牛立志 (168)
从心里送给董老的礼物	朱端绶 (184)
重温董老的教导，汲取前进的力量	刘国安 李树青 (188)
深切怀念伯父董必武	董良泽 (197)
献上一朵心灵的花	晋 掖 (204)

怀念尊敬的董必武同志

王 观 澜

我认识董老是在第一次大革命初期，那时我还在做共青团的工作。以后虽做党的工作，但也很幼稚。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国民党反共浪潮扩大后，我被迫离开浙江临海到上海，在中共上海市沪东区委继续做党的工作。因为白色恐怖严重，我又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分，因此不能继续在上海工作下去，经组织同意到莫斯科学习。开始在东方大学军政班，以后转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前身是中山大学）学习。

一九二八年夏天，董老也到了莫斯科。他编入特别班，我在特别二班，是班长。我们两个班的教室紧靠在一起，只隔一堵薄墙，两边大的动静、比较高声的说话，都能听得清楚。董老经常与别人辩论，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们对学校的意见，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差不多。董老有魄力、有主见、判断明确、革命意志坚强，使我很敬佩。当时支部的领导权掌握在以王明为首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手中，他们搞宗派、搞教条、搞唯成份论，凡反对他们的都被他们说成是托派、右派、阶级异己分子，有的被开除党籍、团籍，有的被送去劳改，最轻的也受劝告处分。受打击的同学们满怀气愤，普遍不满地说：祝你们（指王明一伙）回国后要经得起蒋介石白色恐怖、军事法西斯的考验！果然，他们回国后在蒋介石残酷的镇压下，有的叛变了革命，当了叛徒；有的消极遁世了。但也有有的在党内承认了错误，坚持了革命斗争，成为好同志。总之，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起分化了。我们决不能一概而论。

当时，学校所规定的学习课程及其内容，我们认为一般都需要，但希望增加一点适合中国情况的课程，如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中国革命发展情况和特点，中国革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等等。董老认为对中国的情况、特点不加分折，不懂怎样做工作，只讲教条不行。中国革命失败了，虽然是暂时的，但一定要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董老从同盟会时期就开始革命，他主张对中国革命的问题多研究，好好总结，提高认识。他认为翻译们不把这些意见认真地如实地反映给学校当局，下情不能上达不行。因此，我们提出要求改选支部，但拖了很长时间，直到清党才解决。董老对王明一伙十分不满，常和他们辩论。记得，后来学校开了十天大会，我们同王明一伙在大会上斗争很激烈，闹得学校办不下去。接着放假了，同学们到南方疗养地休息，回莫斯科后便分到各工厂学习生产。这时学校事实上停办了，同学们都分散了，各人很少知道各人的去向。我进了列宁学校，有一位教师给我们讲话，说学马列主义很重要，要好好学习，而且要学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非常重要，好象学几何的定理一样，但是不要照搬照抄，一定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具体问题。这也是董老办事的写照。董老主张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不浮夸、不吹嘘，反对华而不实，诚诚恳恳，脚踏实地，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是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真正有学问的人。

回国以后，一九三二年，我在中央苏区又碰到了董老。我们都在瑞金中央机关工作，相互间常有接触，一直到长征。他对任何工作都是兢兢业业，严于律己，对同志诚诚恳恳。

在长征的时候，我同董老分开了。我到一军团随军工作。董老编在中央直属纵队。董老在长征中是很辛苦的，徐老、谢老等几个老同志都一样。没有菜吃，没有盐吃，没有粮食，有时甚至连糠粃也吃不上，只能以野菜充饥。行军没有马骑，他们有马也舍不得骑，宁可自己步行辛苦些，让马驮点书呀，衣服鞋袜呀，以

及一些零用的东西。长征确实非常辛苦，非常艰险，非常困难，爬雪山，过草地，在敌人前堵后追，飞机轰炸的情况下前进。号称十万的中央红军，长征后到了陕北只有五千七百多人。但我们胜利了，这些老同志也都走过来了。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胜利，是革命的一次重大胜利。没有长征的胜利，就不会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的苦难一定要延长好多年。

到陕北以后，董老就搞教育了，在瓦窑堡中央党校工作。后来党校搬到保安，他就在保安的艰苦环境中办学。后又搬到延安的桥儿沟办学。在那里我们一起拍了几张照片（斯诺给我和他两人合照的那张六吋照片被人拿走了，还有四人合拍的一张在手头）。当大量革命青年涌到延安时，中央命他担任抗大四大政委。我跟董老时常碰头。他常请我去讲讲课，我也愿意去，为了用革命思想武装青年和干部，争取革命更快胜利。

董老的革命品德非常高尚，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不辞劳苦地工作；对同志肝胆相见，诚诚恳恳；对亲属，更是严格要求，毫不迁就。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极深。一件是一九三七年在延安，组织上准备吸收董老的一个堂兄弟入党，董老知道了这件事，当时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董老就亲自到我办公的地方跟我说他的堂兄弟现在入党条件还不成熟，要加强教育，暂时不要吸收入党。另一件事情是一九七三年，他的小儿子董良翻在河北晋县基层锻炼，表现不错，组织上想提拔他当干部，董老知道后，也不同意，反而要良翻继续在基层锻炼。

我怀念董老，他是我的同学，我的同志，我的同事。我现在还要加一个称号，他是我的老师，我的尊敬的老师。他的品德，他的学问，他追求真理的态度，他革命到底的热忱，他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等等，都值得我们学习。更是值得我们青年一代人学习。我要教育我的儿女孙辈踏踏实实地学习董老，学习董老一切可称颂、可尊敬的道德品质。

一个模范的共产党人

吴亮平

我与董老接触的时间比较多一点。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是同学。董老的那个班，当时称为“老头班”，有董老、林老（伯渠）、徐老（特立）、吴老（玉章），还有叶剑英同志。那个时候我十九岁，是娃娃。董老是革命前辈，我们很尊敬他。他很谦虚，看到我们，总爱问问时事问题。

回国以后在中央苏区，开始在红军学校，和董老在一起。红军学校校长先是刘伯承同志，后是叶剑英同志，董老是中央直属队的队长兼政委，好多的红军高级干部是从这里出来的。

后来我调到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董老也在中央政府工农检查委员会工作，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我们一起参加，聆听毛主席的指示。

长征的时候，我到部队去了，先在一军团，后到三军团。董老在中央纵队。我们在行军路上，偶然碰到，虽然路上那么辛苦，但董老的精神总是旺盛的。

在瓦窑堡的时候，党中央委托董老办党校。董老要我兼点马列主义的课。后来到了延安，董老也在党校，还要我在党校兼点课。所以在较长时间，我与董老接触比较多，董老的特点，我觉得有几点很突出。

第一，董老非常乐观。大革命失败之后，董老到了莫斯科。当时有些人情绪不好，董老却很乐观，他说：国民党的统治是不会久的，只要我们共产党人深入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奋斗，革命运

动必将开展起来，对革命运动抱悲观情绪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七年之后，当我们退出中央苏区的时候，某些人又有点悲观，董老却总是不断地劝说他们乐观起来。董老无论在什么时候，就是在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情况下，总是心胸开阔，非常乐观，他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这对我们，特别是对青年同志是很大的教育。

第二，董老非常群众化。无论是在部队，在政府，在党校，在长征途中，或在平日工作中，他都是与群众血肉相连的。长征的时候，董老已经五十岁了，还背着东西走路，真不容易。董老、林老、徐老等老同志虽然有马，但是常常让伤病员或体弱的同志骑，自己拄一根棍子，和群众一起走路。董老平日的的生活总是和群众在一起，是极其群众化的。

第三，艰苦奋斗。董老和林老、徐老等老同志都是一样，在中央苏区就是当了什么部长，生活也和群众一样艰苦，没有任何特殊化。那时吃包子饭（即把米预先分好，放在一个小蒲草包里，煮熟后每人发一包），毛主席一包，董老也是一包，林老也是一包，没有那个多占。菜是一点青菜，加一点盐，每人一小杯，一律平等。当时没有什么津贴，伙食钱有点点剩余（伙食尾子），大家各分几毛钱，至多一块钱，所有人员全是一样的。那时我们的干部同群众生活在一起，甘苦与共，董老更是艰苦朴素，为人师表。

董老努力学习，善于学习，在中央苏区，在延安抗大，都是一样。年纪虽然这么大了，始终好学不倦。

董老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的一个杰出代表。

“始终不息地为党工作”

——怀念敬爱的董老

童 小 鹏

一九三七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党中央决定派有革命斗争经验、在社会上有威望的林老、董老、徐老、谢老代表党中央分赴西安、武汉、长沙、兰州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筹建八路军办事处，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及恢复和建立地下党组织。从此，董老和周恩来同志一道在武汉、重庆、南京、上海战斗了整整十年。在这段时间内，我有幸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作和学习。缅怀董老对革命事业的光辉贡献和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言传身教，更增加我对他的无限怀念。

坚持党的正确路线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董老根据中央的指示，九月份独自到达离别了十年的武汉。武汉是他进行革命活动的老地方，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所以很快就展开了工作。经过他同国民党当局交涉，得到老朋友熊子民等的积极帮助，为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租到了房屋，十月就建立了办事处和报馆，为开展统战工作和宣传工作创造了条件。十二月，根据中央决定成

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为书记，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董必武、叶剑英为委员，李克农为秘书长。董老分管民运部，领导工运、青年、妇女三个组，同时还担负着许多上层统战工作，以及同湖北省委的联系工作。

王明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间曾经犯过“只要斗争，不要联合”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同国民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情况下，他又犯了“只要联合，不要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他拒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的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而实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投降主义方针；他反对毛主席抗日战争要坚持持久战的正确论点，而主张错误的速胜论；他反对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坚持敌后游击战，而认为必须依靠国民党的正规军进行正规战；他看不起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而且亲自上街发表演说，公开给蒋介石抬轿子等等。在这场严肃的原则斗争中，董老同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等同志坚决地站在一道，旗帜鲜明地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

在此期间，尽管有王明的阻挠，但是，周恩来、董老、叶剑英、邓颖超等同志还是切切实实地作了大量工作。董老利用他广泛的社会关系，用不同名义，先后在七里坪、汤池、鸡公山等地吸收了许多爱国青年，筹办了几期干部训练班。学生毕业后即分配到湖北、河南各地，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董老为中原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新四军部队的扩大，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一带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子弟兵不仅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还和我军别的部队共同组成了中原军区，英勇迎击着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罪恶活动。一九四六年春，蒋介石公开破坏停战协定，动员了几十万大军对我

中原军区军民进行绝粮围困。在那艰苦的日子里，年逾六十的董老于该年三月由重庆奔赴汉口，亲至宣化店，代表党中央向军民进行慰问，并帮助解决粮食恐慌，大大鼓舞了士气。董老在宣化店时曾说：“新创这部队时，我曾尽了一份力量，现在又看到这支部队在故乡成长壮大，特别高兴。”同年六月，蒋介石悍然下令对我中原军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在中央军委的正确指挥和李先念等同志的亲自领导下，粉碎了敌人妄图聚歼我军的阴谋。中原军民的英勇业迹，是与批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分不开的，也再一次证明了只要执行正确的路线，依靠群众，英勇奋斗，革命力量就会发展、壮大，就能无往而不胜。

不屈不挠斗敌顽

董老长期驻在国民党统治区，身居虎穴，临危不惧，坚定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政策，广泛团结进步力量和中间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抗日战争期间，董老除了是共产党代表的身分外，还是国民党聘请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董老便利用这些公开的合法身分，在各种场合，抓住时机，积极宣传我党“坚持抗战、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当时，我们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同志，经常以敬佩的心情谈论董老匹马单枪、舌战敌顽的故事。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了抗议国民党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我党七位参政员拒不参加参政会。一九四三年六月，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奉中央命令回延安，重庆南方局的领导重担交给了董老。九月，国民党决定召开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开会前，参政会的秘书长一再敦劝董老出席，并声明决无利用参政会反共之意。经党中央

批准，董老单刀赴会。开到第四天，何应钦突然在军事报告中，颠倒黑白，对我党我军大肆诬蔑。董老当即挺身而出，根据会议原则，驳斥何应钦的反共滥言，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勾当，宣传我党、我军在抗战中已做出的巨大功绩。董老义正词严的质询，使何应钦面红耳赤，不敢答对。国民党恼羞成怒，竟指使一些 CC 分子大吵大闹起来。董老毅然退席，以示抗议。董老理直气壮的言行和国民党的丑态，使许多中间党派辨清了真相，同情我们。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反对内战，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和谈。毛主席亲赴重庆与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在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积极斗争下，国民党代表不得不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签订停战协定，并召开了有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董老和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同志一起，作为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并为维护停战协定、实现政协决议，同美蒋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六年三、四月，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政机关都搬到了南京，他们依靠美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打着和谈、停战的幌子，破坏停战协定，积极部署全面内战，破坏政协决议，准备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为了在谈判中揭露美蒋假和平、真内战的反革命阴谋，争取中间力量和教育群众，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因王若飞代表在四月八日飞机失事中牺牲，由李维汉补）和工作人员，于五月间到达南京，并在南京、上海设立代表团办事处。董老已经是六十一岁的老人了，南京又是有名的“火炉”，整个夏天都是酷暑天气，但他和其他同志一样，一下飞机就开始紧张的工作和斗争，常常是白天进行谈判斗争或统战活动，晚上开会研究情况和对策，一直到深夜。

六月中旬，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大军对我中原军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揭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在东北，占我长春、四平后，又准备向我其他城市进攻。七月，向我华北、华东解放区大举进攻，八月初，国民党空军竟轰炸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驻地延安。这一切，说明美蒋发动全面内战的决心已下，所谓谈判，只是欺骗人民的手段而已。

在对我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国民党特务又在蒋管区残酷镇压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进步人士。六月二十三日，上海人民推选马叙伦、阎宝航等组织代表团到南京向国民党请愿，竟遭到特务毒打。当夜二时，周恩来、董必武亲自到中央医院慰问受伤人士。七月十一日和十五日，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军队占领我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当天，蒋介石下令召开一党包办（我党和民盟等民主党派拒绝参加）的“国民大会”，并于十一月十五日正式开场。至此，国民党已将谈判之门最后关死。他们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已全部暴露。

在这一段时期，董老和周恩来等同志，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同美蒋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通过我《新华日报》（在重庆）、《群众周刊》（在上海）、《新华社电讯》等报刊，采取招待记者、发言人谈话等各种方式，把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决心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人民民主力量的阴谋，予以揭穿和痛斥，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和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教育和团结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群众。这是我党代表团和全体工作人员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得来的成果，也是同上海、南京、重庆等地的地下党的密切配合分不开的。

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在代表团办事处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国民党一手包办“国大”，是破坏

政协协议，违背全国民意，企图使独裁、内战、卖国合法化，中共坚决反对，决不承认。国民党已将谈判之门最后关闭，中共代表团将于日内回延安。中共仍将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当即宣布，京、沪两办事处仍然保留，由董必武、钱之光两同志主持。

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李维汉、邓颖超同志率工作人员十余人飞返延安。从此，同美国和国民党代表的联系工作，对第三势力的统战工作，党的宣传工作以及京、沪地下党的领导工作，都由董老担负起来。

还应该提到的是，除了上述工作外，董老还以解放区救济总会主任身分，对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在救济工作中不公平合理的情况进行了揭露和斗争。董老向他们提出的备忘录严正指出：联总、行总在中国的救济善后工作，始终未按合理原则分配，解放区难民占全国难民总数的五分之三，而所获救济物资仅占二百分之一，“充分暴露了政治歧视”；国民党政府“操纵了救济物资之分配与发放，利用该物资作为内战资本，借以扩大今天中国的内战”。对国民党飞机轰炸联总运往解放区的救济物资，董老提出了强烈抗议。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三日，董老又为黄河堵口问题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五日，董老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严厉谴责国民党当局撕毁有关黄河复道问题的协议，不按协议规定的时间引导黄河水入故道，企图放水淹没在下游居住的解放区人民的罪行。

一月十二日，董老对马歇尔离华前的声明发表评论，指出：“如无美国之装备、运输，中国内战决打不起来”，“美帝国主义者应负中国内战之责任”。

二月中旬，董老正在上海工作，南京办事处由王炳南和我负责。当时，随时都作撤退和被非法逮捕的准备。当我们获悉国民

党政府要把南京、上海、重庆的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人员全部撵走的消息时，董老及时指示我们照预定计划布置撤退。我当即通知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使他们也得到了几天的准备时间。我们在各地都作了井井有条的布置，需要疏散的干部疏散了，我直接设置的秘密电台也妥善地交给了地下组织。所以，当二月二十八日国民党政府通知南京、上海、重庆三地我方人员全部于三月五日前撤退时，我们虽然满腔愤怒，但沉着冷静，一切按事先的布置行事。三月七日，在董老率领下，我们留京、沪的工作人员七十四人，从容地走出了特务包围圈，离开南京飞返延安。在南京机场上，董老发表了书面声明，指出国民党违反全国人民的愿望，一手割断国共关系，进行内战，“终必失败，好战分子将自食其恶果”，并充满信心地向到机场送别的朋友说：再会之期，当在不远。

历史是无情的。董老和我们离开南京两年以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百万雄师过大江”，“天翻地覆慨而慷”，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直捣蒋介石的“总统府”，宣布了蒋家法西斯王朝的覆灭！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董老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十二月十日，他率领政务院指导接受工作委员会人员到南京，指导接受国民党政府的人员、档案、财物等事宜，实现了他的在南京再会的诺言。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董老又回到战斗过八年的重庆，他在红岩革命纪念馆题诗，高度概括了他当年的战斗豪情。诗曰：“到底人民胜，红岩不枉居。孰论持久战？谁写败降书？诸问今皆白，当时惑未祛。结庐在虎穴，纸虎逊黔驴”。